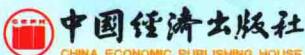


*Study on Cil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农业转移劳动力 市民化研究

欧阳慧 /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研究

欧阳慧 著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研究 / 欧阳慧著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12

ISBN 978 - 7 - 5136 - 3627 - 8

I. ①农… II. ①欧… III. ①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中国 IV. ①F3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4657 号

责任编辑 邓媛媛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巢新强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33.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179 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5416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88386794

前言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吸纳了大量农业转移劳动力，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受城乡二元体制和经济转型的影响，我国农业劳动力“不完全转移”特点显著，尚有规模庞大的已在城市就业的农业转移劳动力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城镇化质量不高，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影响社会和谐进步。

本书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以促进城镇化转型发展为主题，以加快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为主线，研究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形成机理、流量与存量，以及其市民化的障碍、路径、相关改革创新等。经过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一定价值的观点：一是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形成进入了新时期，市民化已成为面临的紧迫任务。二是 2010 年我国流动人口为 2.43 亿人，其中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实为 1.28 亿人，但根据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情况，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增长潜力大概还有 1.6 亿人，如果不加快市民化进程，预计到 2030 年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将达到 3 亿人左右。三是各地实践表明，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有利因素在增多，但市民化的推进要加快总体部署、因时因地突出重点，深化改革并建立激励和惩罚机制，赋予农业转移劳动力稳定的制

度预期。四是实现农业转移劳动力从“不完全转移”向“完全转移”转变，推进市民化已经势在必行，要将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制订国家行动计划，进行系统设计和整体安排，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在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加快市民化制度创新，构建过渡性制度安排，力争用2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问题。五是制订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路线图，争取落户沉淀60%、常住稳定30%、原籍回流10%，并科学把握好强度和节奏；要以城市群为承接空间主体，大中城市和县城为重要支撑，并实施落户安居、就业创业、子女教育、社保安全网、农村土地流转、权益保障六大市民化的战略性工程。六是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受二元结构和体制转型的双重制约，制度变迁是重要影响因素。户籍制度改革要分类指导，在远期规划与近期推进中逐步深化；聚焦大城市，在改革攻坚中逐步降低大城市落户门槛；统筹区域，在区域联动改革中缓解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创新机制，在强化中央政府责任的同时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公共服务制度的改革要在积极推进城乡接轨统一的同时，加快推进普惠型城镇公共服务延伸覆盖全部农业转移劳动力，并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劳动力享有限制型公共服务。农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在宅基地，要以健全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制度，建立农村宅基地流转体系，推进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所有权抵押融资为重点，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笔者来自农业转移劳动力外出较多的中部农村，也在农民工输入地区学习、工作、生活过，有机会对农民工有更多的关注，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有自己更深的感触、更多的理解。这些经历，也让我更加深刻感受到只有加快推进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才是他们的重要出路，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而在此过程中笔者如果能提出哪怕一点点理性思考都备感欣慰。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酝酿形成了本书的写作计划。令人欣喜的是，201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把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

在书稿付梓之际，我要真诚地感谢为本书付出巨大努力和帮助的人

们。首先要感谢国家发改委王一鸣老师对本书的悉心指导，感谢单位领导肖金成、高国力让我有更多机会开展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感谢同事申兵、涂圣伟等同志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热情帮助，其他同志容不在此一一列举。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为此书出版的辛勤付出。

本书是笔者近年来从事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研究的一些思考和积累，但愿能够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这方面的探索和争鸣当中，为积极稳妥推进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并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以及本人专业领域、自身水平的局限性，书中不足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对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欧阳慧

2014年8月于北京

目录

第一章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形成

- 第一节 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形成的特殊背景 001
- 第二节 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形成机理 004
- 第三节 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形成的阶段划分 011
- 第四节 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发展态势 022

第二章 农业转移劳动力的流量与增长潜力分析

- 第一节 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流量 031
- 第二节 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增长潜力 037

第三章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必要性和面临的障碍

- 第一节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传统模式 051
- 第二节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必要性 055
- 第三节 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面临的障碍 059

第四章 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地方实践

- 第一节 各地的实践与面临的挑战 071
- 第二节 成都模式 079
- 第三节 重庆模式 082
- 第四节 中山模式 084
- 第五节 地方实践的启示 095

第五章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战略部署与路线图

- 第一节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认识基点 099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研究

第二节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战略思路	101
第三节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路线图（一）	105
第四节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路线图（二）	112
第五节	配套性举措	118

第六章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重点区域

第一节	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分布的重点区域及特征	126
第二节	我国重点区域农业转移劳动力流动趋势分析	128
第三节	我国重点区域农业转移劳动力分布展望	133
第四节	我国重点区域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策略重点	138

第七章 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第一节	21世纪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展	147
第二节	户籍改革的地方实践模式比较	155
第三节	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隐忧	161
第四节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设想	164

第八章 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研究

第一节	农业转移劳动力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居民 的差距分析	169
第二节	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重点	175
第三节	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184

第九章 市民化的农地制度改革

第一节	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中农地改革的必要性	189
第二节	深化农村承包地改革	195
第三节	各地农村承包地改革实践	196
第四节	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	200
第五节	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有期限使用制度	209

参考文献 219

第一章 我国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形成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嬗变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的大幅度下降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配第—克拉克^①、库兹涅茨^②均从不同角度上揭示了这一现象。世界上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完成这一过程。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是在此后逐步推进这一过程。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形成又有怎样的一个背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呢？本书的农业转移劳动力，俗称农民工，指已经在城镇获得工作岗位的农村劳动力，但户籍没有相应转变为就业地的户籍，即身份没有转移而职业发生了转移的农村劳动力。

第一节 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形成的特殊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转型发展期，这不仅是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转型时期，而且是从

^① 配第最早（1690年）揭示了农业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的内在动力是比较效益的差异，隐含了产业“软化”的思想。两个世纪以后，科林·克拉克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著名的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即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而后进一步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参见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② 相关文献参见[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阶级增长 总产值和生产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迅速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二元经济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叠加，构成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制度背景。

一、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调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支持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逐步放开农产品流通和价格，培育农村商品市场；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发展小城镇等。这些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的实施，促进了城乡经济结构的积极变化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城乡分割的体制，它呈现以下特征：①实行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公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包括户籍管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和福利制度，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以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还在相当程度上被延袭下来，事实上造成了城乡居民身份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平等和享受的社会福利不平等。②实行城乡市场的分割。从商品市场上看，城市企业真正面向农村市场的很少，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低，一般只能进入城市集贸市场进行零散的、小规模的现货交易，基本上没有进入批发市场，更难以参与大宗远期合约和期货交易，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批发贸易基本上仍由国有流通企业垄断经营。从要素市场上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因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和受利益驱动，主要面向城市经济，城市相对充裕的资金没有进入农村，农村有限的资金还在通过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流向城市；农村土地流转还不能市场化，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土地所有者集体和使用者农民都不能享有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增值收益。③城乡产业缺乏有机整合。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没有形成有机联系，农民难以分享农

产品的加工增值收益；乡镇企业在管理体制上独立于行业管理之外，既无所不包，又自成体系；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并行发展和过度竞争，使得农村工业在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后，发展空间受到明显制约。④实行城乡差别政策和要素投入向城市倾斜。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国家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时依靠农业积累支持城市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经济效益驱动下，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投资上，继续向城市倾斜，农村却在一定设施上继续依靠自我积累，如“三统筹、五提留”，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由此带来城乡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至今，我国城乡二元的差距仍然比较突出。①“三农”问题突出。农业人多地少、细小经营，农产品市场容量小，农民收入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差；农业欠账多，根本改善的难度大。②城乡差距大。城乡人均纯收入差别过大，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表面差距为3:1，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在内，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6:1。③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严重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农村，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积累率、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协调。④要素流动配置不尽合理。虽然国家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但发展要素和资源向城市倾斜的特征没有改变。因此，城乡二元经济仍然是制约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基本制度性因素。

二、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还面临另一种“非典型性”的制度背景，就是要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转换为一重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而逐渐建立了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户籍迁移制度以及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受

到了很大阻碍，以至于就业结构的转换大大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村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大了改革力度，使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变化表现在资源配置方式的双轨运行，计划配置方式不断缩小，市场配置方式不断扩大，两种配置方式并存形成了国民经济双轨运行的局面。目前，我国“旧双轨制”（价格双轨制）从孕育、出台到淡出，大部分商品和服务均已经市场化。但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仍未真正市场化，出现了“新双轨制”：①资金价格管制和资金配置失衡。如扭曲的利率市场价格，利率不能市场化，存贷款利率受行政管制，以低于正常使用价格的资金通过银行再流向贷款量最多的国有企业及其他有相关背景的企业（如自有资金不足需大量支持的房地产企业等），使存款人的利益受损。②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征地制度明显的权力寻租化。如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设计的“征地、补偿、批租”制度，为政府及有其背景者滥用“公众利益”之名而损害农民利益在法理上大开方便之门，在对农村集体土地低价“征用”后高价转让和国有土地划拨后获取巨大收益。③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和资方利益的难以撼动。如工人工资特别是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工资长期低下，近十年无实质增长，而且工作环境恶劣、劳动保护欠缺，灾难事故不断发生，更有长期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甚至是全体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欠账。

第二节 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形成机理

“推拉理论”是研究劳动力转移行为发生原因的重要理论，认为转移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推拉理论对劳动力转移的解释具有综合的特征，一般认为推拉因素可能多种多样，任何一种因素在迁出地或迁入地的具体情况都可能成为推力或拉力。二元经济理论认为，二元经济结构中低下的农业劳动所得的推力以及城市较高工资水平的吸引力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或者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一、农业转移劳动力形成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一) 刘易斯模型^①揭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

该模型通过“二元结构论”指出了城市工业部门与乡村农业部门在结构、经济上的差异，认为通过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加速城镇化进程，既可以加速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又能摆脱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的困境。目前，我国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从1992年的2.58扩大到2011年的3.13（见图1-1），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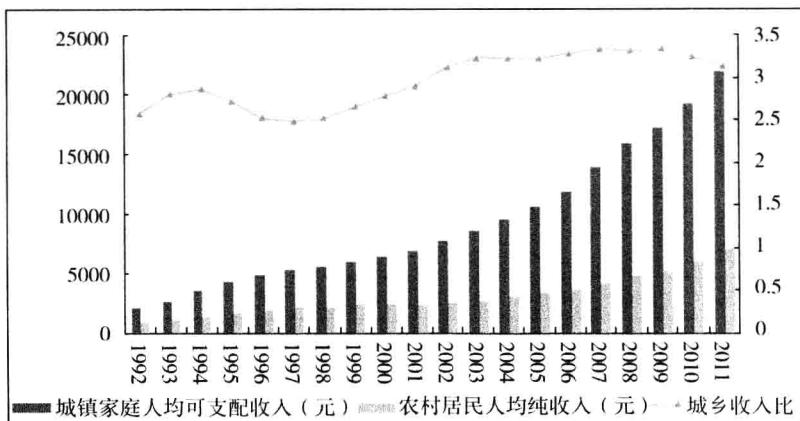


图1-1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及发展趋势（1992—2011年）

(二) 托达罗模型^②揭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性

该模型认为仅靠工业扩张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并不能较好解决城市失业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也难以根本实现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用我国相关数据按照该模型公式计算可以看出，城市预期收入与

^① 又称“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由阿瑟·刘易斯（W. A. Lewis）于1954年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② 又称“期望收入理论”，由托达罗（M. P. Todaro）在1969年提出。他认为，人口由乡村迁往城市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以及获得城市工作的可能性有关。城乡之间的期望收入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

城市就业概率成正比，但农村流出人口并不完全与城市预期收入相关（见表1-1）。因此，为缓解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可能导致的失业率进一步上升问题，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实现就地吸附和就近转移是现实选择。

该模型公式具体表示为：

$$M = f(d) = f[W \times (\lambda - \rho) \times N / (S - N) - Q]$$

其中， M 表示农村人口流出量，是对城市的预期收入 d 的增函数，是城市实际收入 W 与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与农村实际收入 Q 的差；而城市就业概率是由工业产出增长率 λ 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ρ 之差形成的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与就业人数的乘积与失业人数之比。

表1-1 用托达罗模型计算的相关数据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城镇从业人数 (万人)	失业人数 (万人)	工业产出增长率 (%)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 (%)	城市就业概率 (%)	农村人口流出量 (万人)
1993	2162	795	18262	660	15.9	12.8	3.1	0.87	4864
1994	2622	935	18653	680	14.6	11.9	2.6	0.72	4355
1995	3563	1301	19040	790	11.3	9.89	1.4	0.34	4286
1996	4413	1773	19922	815	8.9	8.80	0.2	0.04	5322
1997	5000	2038	20781	980	7.5	7.91	-0.4	-0.09	6515
1998	5457	2183	21616	1450	7.6	6.53	1.1	0.16	7880
1999	5930	2243	22412	1397	8.5	6.43	2.1	0.34	9211
2000	6229	2255	23151	1907	10.7	7.34	3.4	0.41	10586
2001	6811	2347	24123	1087	9.0	7.2	1.8	0.4	11666
2002	7779	2485	25159	1212	11.6	8.2	3.5	0.72	12060
2003	8396	2580	26230	1175	13.7	9.3	4.4	0.99	11756
2004	9110	2795	27293	1026	7.6	9.3	-1.7	-0.46	12193
2005	10325	3183	28389	1473	6.1	10.6	-4.5	-0.87	12391
2006	11583	3533	29630	1337	6.6	12.1	-5.5	-1.2	14084
2007	13165	3916	30953	1210	7.9	13.6	-5.7	-1.4	16259
2008	14897	4451	32103	1482	5.4	9.2	-3.8	-0.8	17760
2009	17329	5168	33322	1682	7.6	8.8	-1.3	-0.3	19356

资料来源：龚桢梽，陈磊.统筹解决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R].国家发改委中青年论文.

二、特殊制度背景下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形成机理

(一) 不考虑制度因素下农业转移劳动力形成的基本模型

假设存在劳动力迁入和迁出两个区域，在迁入区和迁出区之间存在着包括预期收入差别、经济机会的差异、居住环境的差距、交通便利程度的差异以及人际关系亲疏等各种推拉因素。这些因素对劳动力流动起着推拉作用。

以劳动力迁入区模型分析的对象区域。相对于迁出区，迁入区存在着工作不稳定、生活成本高等推力因素，它们与劳动力流入规模之间的关系可用图 1-2 中的曲线 SMC1 表示，即推力越大，流入规模越小。推力因素的变化，流入规模相应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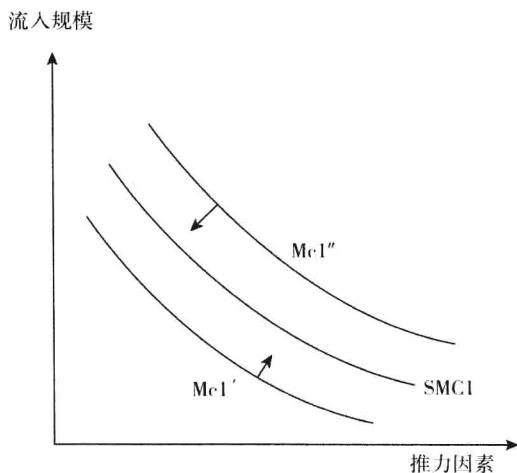


图 1-2 制度既定下的推力因素与流入规模

与此同时，迁入区也存在较好预期收入高、交通居住环境好等拉力因素，它们与劳动力流入规模之间的关系可用图 1-3 中的曲线 SMC2 表示，即拉力越大，流入规模越大。拉力因素的变化将引起相应流入规模的变化。

在推拉力的综合作用下，SMC1 与 SMC2 相交于 E 点，在此处拉力与推力作用相当，劳动力的流入规模和流出规模相等。当推力大于拉力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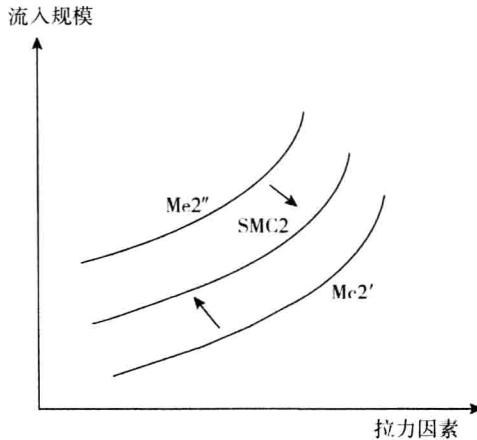


图 1-3 制定既定下的拉力因素与流入规模

该区表现为劳动力流失。其流失规模如图 1-4 中 1 所指示的区间；相反，当拉力大于推力时，迁入区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入，流入规模可以表示为图 1-4 中所示的区间 2。所以，迁入区要遏制甚至减少劳动力的流失，不断扩大劳动力引进规模，就要想方设法增加拉力因素，增强拉力因素的综合作用力，减少推力因素，降低其综合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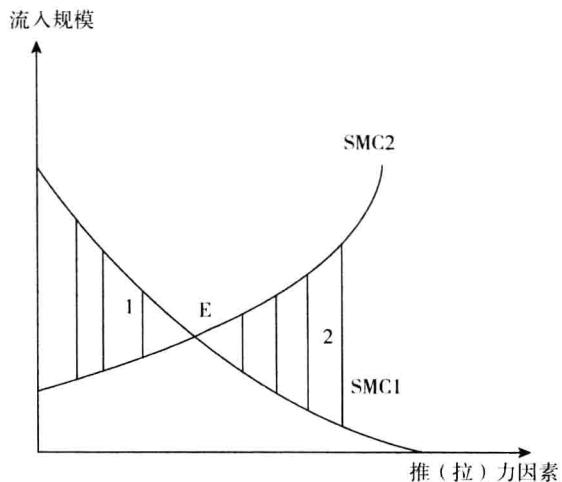


图 1-4 制度既定时推拉力模型（基本模型）

(二) 特殊制度下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形成机理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还存在特殊的制度背景，即二元经济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叠加。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破解二元经济和推进体制转型，成为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所谓制度就是指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种制度规则进一步约束着人们行为的“选择集”^①。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来说，一定的制度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劳动力转移的方向、流量，对劳动力转移行为形成“规制约束”。制度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变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例如，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形成制度约束。在户籍制度“规制”严格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量是很小的，而且多为非经济原因（如婚迁、复员军人转业、录取学生、落实政策返城、征用农民土地而使农民转业等）所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制度的变迁使得农业劳动力转移趋向“自由化”。但是由于客观存在的制度惯性和部门利益冲突，使得制度变革难以推进。

制度变迁已经成为破解二元经济和体制转型的“利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机理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就需要在劳动力转移模型中加入制度作为控制变量。而制度作为控制变量会使推拉因素的综合作用力放大或缩小，这种放大或缩小主要表现为作用线斜率变大或变小。即制度决定了这条曲线的斜率。制度变化时，出现不同斜率的迁移曲线。制度决定的流动自由度越大，则出现斜率较大的劳动力迁移曲线。如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制度下迁移曲线的斜率就比较大（图1-5中SMC2”）。在不同斜率的曲线上，拉力因素相对于流入规模的弹性不同，斜率越小，拉力因素的作用弹性就越小；反之，弹性就越大。拉力因素作用弹性的差别很好地反映出拉力因素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对劳动力流入规模的不同影响力。由此看来，制度决定迁移曲线的斜率，继而决定拉力因素对劳动力流入规模的作用弹性，决定拉力因素最终的推拉效力。相应地，在制度变迁的条件下，推力因素与劳动力流出规模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图1-5的不同推力曲线。

^① [美]约翰·康芒斯.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